

不完美的社会

不完美的社會

譯蒼葉・著斯拉吉



今日世界出版社

不完美的社會

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
by Milovan Djilas. Copyright © 1969 by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4th printing

August 1976

不完美的社會

吉拉斯著 葉 蒼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第0066號)

台灣總代理：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館前路59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1087號

郵購劃撥帳戶 13294 號

1976年8月4版

定價：港幣3元・新台幣30元

封面設計：譚乃超

吉拉斯的生平

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於一九一一年生於摩德尼格羅(Montenegro)。一個可怕的地方。他的那本名為「沒有正義的地方」，敘述他年輕時的生活的書，所描寫的就是摩德尼格羅。現在他住在貝爾格拉德(Belgrade)。在他成年以後，差不多有三份之一的時間是在監獄裏渡過的。一九二九年，他到貝爾格拉德進大學。不久之後，他即成為共產黨的組織者，由此而受過酷刑和入獄三載。二十七歲時，他已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一九四零年成為政治局委員。德國佔領南斯拉夫時，他成為游擊戰士和領導者。一九四四年，他以游擊隊將軍的身份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莫斯科。第二年，他以戰後共產主義政府一名部長的身份再次訪問莫斯科，與史達林及其他蘇聯領袖會談。一九四八年，他再度率領一個代表團到莫斯科去，這回的目的是在設法避免兩個共產主義國家關係的破裂，但沒有辦法，破裂終於在這一年後半發生。破裂之後，吉拉斯便致力於表現南斯拉夫為一個「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同時為戰後東歐的「民族共產主義」辯護。

吉拉斯與南共領導者思想的分歧開始於一九五三年。他寫了一些批評政府官僚主義的文章，後來他稱那些黨官僚爲「新階級」。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因之被黨的中央委員會開除。在他與黨的領導者衝突及被剝奪中央委員的名銜這段時間內，他致力於寫「新階級」和「沒有正義的地方」。前者是一種對於共產主義寡頭統治的卓越的分析。在他未被捕以前，這兩本書稿都已送到出版人那裏。一九五五年，他被審訊後判處徒刑三年，但准緩刑，罪名是進行「敵意宣傳」，所根據的是他對紐約時報記者的談話。匈牙利起義之後，他公開指責南斯拉夫政府沒有譴責蘇聯的侵畧，這同他被關進米特洛維迦監獄了。這座監獄也就是他年輕時因從事共產主義而被囚禁的同一座。到一九六七年爲止，他一共在那裏面渡了九年的歲月。一九五七年「新階級」出版時，他又從獄裏被提出審訊，延長了他的徒刑。「沒有正義的地方」則出版於一九五八年。

從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他被有條件釋放時止，他都從事寫作，在被單獨禁閉的二十個月中也一樣。他所完成的有關於尼果希（Njegos）的傳記一鉅冊（尼果希是摩德尼格羅的偉大的王子、詩人兼教士，此書已於一九六六年出版），「摩德尼格羅」（關於摩德尼格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形，有虛構也有史實，已於一九六三年出版）和十六篇短篇小說（編爲「癡瘋者及其他」，於一九六四年出版）。一九六一年被釋出時，他寫了一本關於他會見史達林的情形的書，書稿於同年寄給他的美國出版人。南斯拉夫政府因之又來找他。他於一九六二年四月被捕，不久之後，他即以「發表供職政府時所獲得的情報」的罪名被起訴。（他被所据以起訴的法例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才通過的，但他的書稿的存在，大家却早已知道了）他的美國出版人曾設法營救他，但沒有結

果，該書終於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吉拉斯又被投入米特洛維迦監獄，直到一九六六年底。他的被釋出是無條件的，但却限制他在五年之內不准作任何公開的聲明。

吉拉斯再次入獄時，他又從事寫作，不管環境如何困難。這回他沒有被單獨禁閉，但却差不多有兩年不能獲得紙張——他用衛生紙寫——他所住的監房，除了晚上一段短時間外，白天從不准生火取暖。但他終於寫成了四本書稿：一本長篇小說，名為「失敗的戰役」，（將於一九七〇年出版）一本短篇小說，名為「紫羅蘭與石」（也將於一九七〇年出版）一本是米爾頓的「失樂園」的塞比亞——克羅亞文譯本（是這種文字的第一本譯作。另一本長篇小說，名為「世界與橋樑」，作者在修改中，還沒有決定出版與否）。被釋放後，吉拉斯即從事寫這本「不完美的社會」。在他於一九六八年到美國來逗留兩個月的時候，他於十月十三日將書稿交給本書的出版人。

吉拉斯是被禁止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發表任何作品的。他被釋出後，曾一再向當局要求把這禁令取消，並且給他護照，使他得以出國旅行。他雖然獲得養老金，並於捷克危機發生時，當局突然發給他可以旅行英、美的護照，但關於他發表作品的禁令却未取消。儘管如此，吉拉斯還是逕自和他的出版人安排好了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他的這本「不完美的社會」和他用塞比亞——克羅亞文翻譯的「失樂園」。這兩部書在南斯拉夫都是買不到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他回到貝爾格拉德去和他的妻兒同住。在美國時（他第一次到美國來是一九四九年，作為南斯拉夫出席聯合國的代表），他是普林斯頓大學公眾和國際事務學院的公眾和國際事務協會的會員，大部份時間都住在普林斯頓大學。在那裏，他可以訪問他的鄰居史達林的女兒史維特拉娜（Svetlana Alliluyeva），也可以會

晤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後者當吉拉斯爲「史達林談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一書而被捕時，正任美國駐南斯拉夫大使。大家都或者不無今昔之感罷。吉拉斯在返國之前一天，獲「自由之家」贈給「自由獎」。前此獲此項褒獎者包括卡沙斯(Pablo Casals)、莫奈(Jean Monnet)和邱吉爾等人。

吉拉斯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見解，其重要性不單因爲其本人曾因這些見解而受苦，也因爲其曾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統治者，當他和南斯拉夫共產黨決裂時，他是南斯拉夫的四個領導人之一，其他三個是鐵托、卡特爾茲(Kardelj)和朗可維克(Rankovic)。於一九六六年爲鐵托所撤換，罪名是非法操縱秘密警察。吉拉斯並且被一般人認爲是鐵托的繼承者。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四年間，吉拉斯曾先後做過部長、副總統和聯邦國會議長。他和另一位老黨員比雅德(Mosa Pijade)同是當時最有名的政府發言人和共產主義理論的宣傳家。在被逐出中央委員會和自請退黨之後，在十五年長長的歲月中，吉拉斯感悟到人類的社會到底是不可能完美的，他所要求的祇是一個不完美，但却是可以改良的社會，而在這個社會裏，人們却可以過有更多自由和更爲多采多姿的生活。

引言

這篇引言本來是可以不必寫的，要是我可以無須越過政治的障礙而把這本書出版的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當我完成了「新階級」一書的寫作的時候，我便因為對匈牙利人民的起義發表過聲明和一些文字而被南斯拉夫當局抓到牢裏去。我身在獄中，心情和夢想却留在獄外，我強自按納，在淒涼寂寞和慢性死亡中磨鍊我自己。在這種苦惱中，我的思想終於澄定而明澈起來。

「新階級」完成之後，我突又有新的創作衝動，新的意見和主題。這種衝動十分強烈，因為我覺得，在「新階級」一書中，我雖然會對那我會協力使之實現的社會加以評價，但對於未來的展望和可能的轉變却極少觸及。事實上，我雖曾深入這個社會昏暗的角落，却未能找到解決的辦法。說也奇怪，我所想寫的書，却遲遲不能下筆，因為我老想不出一個書名。我須得把書的主題結晶為一個書名之後，才能安排詳細的內容。

我在獄裏渡過三四天之後，有一次，當我走向那四面爲五層樓的房子所圍住的院子的時候——我每天在那邊運動一小時——忽然想到我那本在構想中的書，應該取名爲「不完美的社會」：這正好和共產主義者的完美而無階級的社會相對照，共產黨人正以實現完美的和無階級的社會爲藉口來繼續其獨裁和特權的地位。在十一月黯淡的天空之下，我踏着混凝土的聲音，就好像在告訴我「不完美的社會」……「不完美的社會」……。

在這裏，我也許得解釋爲什麼我用「不完美」(imperfect)這個字。我故意用這個字，以示與常用的「不完全」(imperfect)有別。一如我將在以下各章中所論及的，我相信社會根本就不可能完美。人必須有思想和理想，但他切不要以爲都可以完全實現。我們必須了解烏托邦主義的性質。一種烏托邦主義，當其取得了權力時，便成爲一種教條，便極易於以其科學主義和理想主義來使人類受苦。我若說社會是不完全的，其含義便好像是說社會是「可以」使之變爲完全的。但事實上社會却是不可能完全沒有缺憾的。我們所應取的態度是認社會是不可能完美的這一事實，但同時也得了解人類必須有其夢想，社會才能改良與進步。

從我的獄中日記以及我所保存的第一次入獄時（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所寫的筆記（這些筆記在我於一九六一年被釋時，爲當局所扣留，直到我於一九六七年再度被釋時才交還給我）中，都可以容易地發現與本書同樣的議論，雖則當時的語氣不免雜着憤慨和失望。一九六一年一月出獄時，我曾試着使這本書稍具眉目——寫下一些意見，搜集材料和起草大綱。但也許是運氣不好，也許我的寫作衝動不夠強烈，終於未曾寫下去。而無論如何，在「史達林談話錄」這本書正將出版時，我又

爲南斯拉夫當局所逮捕了。我又渡過五年的牢獄生活。但我想寫這本書的決心從未放棄。在這個期間內（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我所寫的長篇和短篇小說以及筆記和日記等，也都散佈着像在本書裏所顯示的那種思想。獄中生活的寂靜和我自己心境的澄定，使我的思想成熟，不雜憤慨。這些思想是我生命之所寄，我到今天仍在培育它們。現在我把自己和我的家庭的重要事情都處理好了，我便着手來寫和出版這本書。

假如「新階級」所寫的是關於一種英雄的和悲劇的集體經驗，那麼，這本「不完美的社會」是我獨處苦思的果實。

我在一九五六年即起意寫這樣一本書，作爲「新階級」的續編。這些年來，社會上已出現了種種的情況，使我這本書能夠寫得更爲完整。在一九五零年代中期，我在「新階級」所描寫的社會的變化還未明顯，對其趨勢難以作可靠的預言。但我現在也不想作預言。其他的變化也已發生，而這些變化又將催生新的觀念和新的事業。

在這篇引言中，我將不再多引述「新階級」一書中的見解。我的思想的轉變，或者更正確地說，我所描述的情況的轉變，讀者自可以從本書中看出。不過，我仍願請大家注意兩點：

第一，在「新階級」一書中，我所用的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質言之，「新階級」一書是對當代的共產主義作馬克思主義式的批判。當時我也覺得我是在腐蝕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因爲實際上我是在揭穿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社會的真相。當我在寫「新階級」時，我時而因爲我在把我前此的工作和信仰加以破壞而感到狂喜。（我記得我曾在半昏狂的狀態中，寫下一些句子或一整

頁，眼裏彷彿看見黑壓壓的羣衆，爲了我所揭發的真理，自己動員起來，投入戰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在「新階級」那本書中，是從核心腐蝕了的。我當時只能從一些幻想和徵兆以及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採集來一些觀點，來說明共產主義的名實不符。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在暴露現社會的矛盾上，雖然還是一種鋒利的工具，但作爲探求新的，用以代替舊的社會型式，却是不夠的了。假如在這本書裏，人們仍可以找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的話。那是因爲馬克思的一些成就，雖經若干修正，已經成爲現代社會科學和現代思想的一部份——例如關於社會型式轉變的可能性，關於任何社會內部矛盾的不可避免性，關於經濟因素在社會和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把社會作爲科學研究的對象等，這些觀點，仍爲我所尊重，也因爲我總是有意無意中以我自己的國家爲談論的對象。

第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在使我達到在「新階級」一書中的基本論旨方面也許並不重要，但在我就這一論旨加以發揮方面却是很重要的。在這一點上，我必須加以說明。每個讀過「新階級」這本書的人都知道，書中的基本論旨是這樣：共產主義革命或蘇聯軍事行動所造成的社會，也和其他的社會一樣，爲同樣的內在矛盾所分裂。結果是，共產主義社會不單不能朝着人類博愛平等方面發展，並且在黨官僚制度中產生了一個特權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我根據馬克思思想名之爲新階級。我知道美國和西歐都有人反對我的說法，但我對那些善意的有學問的批評未能完全領悉。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他們對我這種見解，也正如對整本書一樣，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加以歪曲。我可以說，反對我的見解的意見可以歸納如次：一個社會的繼續和變動——特別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社

會，在那裏，財產的所有權已經不像舊社會那樣的作正式的區分——是沒有公式可循的，而社會的轉變，也不能純由其階級的結構來解釋。

達倫道夫教授（Ralf Dahrendorf）在其「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一書中（一九五九年）曾間接地對我批評，說把階級看成社會——特別是現代的社會——中一種最後的和不變的事物，這種看法是不健全和不足取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會使人對社會只作純理論上的研究。換句話說，只有一種不從預定的「真理」或「規律」出發的分析，才可以使人在某些限度上發現某一特定社會的真相，並從而猜測其發展的趨勢。我對於這種分析社會的方法沒有異議，但我只想鄭重地說明一點，我在「新階級」一書中之所以在有些地方以階級立論，不單是因為我那時仍未能擺脫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也因為我想用共產主義社會制度所依以建立的理論來暴露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真面目。

我當時雖然已經覺察到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已不能對當代的許多現象作滿意的解釋，就是共產黨人也不能感到滿意，但我仍覺得他們的教訓是用來暴露共產主義理論與實際不符最適當的工具。「新階級」一書，由於指出了根據馬克思理論建立的社會，不單不能實現馬克思的理論，並且實際上走向另一個方向，這便預示出馬克思的教訓實在不能解決現世界的問題。這對於東歐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是特別重要的。因之，「新階級」這句話只是特殊地用來指那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新的特權統治階層。這個階層的存在，是所有嚴肅而公正的批評家所不能否認的。說句老實話，我並不是第一個使用這個名詞的人。我在寫「新階級」這本書時，已知道布哈林（N. J. Bukharin）、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貝爾特耶夫（N. A. Berdyev）等許久以前就已用它來形容同樣的社

會現象，雖則他們那樣說祇是一種預言而非分析的結果。還有，在南斯拉夫，克里斯特（Kristi）和史達諾維尼克（Stanojk）在「新階級」未出版之前不久也曾指出（事實上是和我辯論的時候）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的官僚已組成了一個階級。不過他們今天已不再這樣說了，因為這已被認為一種可惡的異端。

這就是我今天對於「新階級」一書的觀點和方法的意見。爲了使讀者更明瞭我的政治見解，以及我對其他各種批評的態度，我將畧談那極端反共方面對「新階級」的批評以及共產黨人方面對該書的全無批評。

第一種批評來自反共的南斯拉夫人和蘇聯的僑民。他們的論調大概是這樣：吉拉斯在「新階級」以及其他文章中所發表的意見我們都早就知道了。不過，那些話從一個不久以前還是共產黨的領袖和思想家的口裏說出來總是有意義的。我對於這些人對共產主義制度的了解不能無疑，因為他們都是從共產黨手裏吃了虧的，對共產主義有先天性的嫌惡。我雖然承認我自己是共產主義官僚制度的主要批評者，但我從不以爲我自己是反共的，至少不像那些反共十字軍人物的所謂反共。「新階級」一書中誠然充滿了悲憤，但就是在這本書裏以及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我也從未曾把共產制度看成一種偶然的產物。不，在「新階級」裏以及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我都指出了那些使人願爲和能爲共產主義制度而戰的情況。我沒有預言如何來改良或如何來代替共產主義制度。我的見解是，在某種情況之下，共產主義制度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它已經出現了，存在了，那麼，任何實質上的改良都得求之於這種制度本身。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即使各有其範疇，我們也決不能純用這種標

準來衡量共產制度的價值，更不能以之爲反對共產官僚制度甚至共產主義本身的策畧。無論這種制度是善還是惡（我相信這種制度越存在得久越壞，因爲照現在的情況來看，它越來越加深了人民的負擔），它已經影響到了全人類，它的存在也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一樣的真實，因之我們對這種制度的態度，必須避免感情用事。換句話說，那些不懂得共產主義一定會在某些國家獲得勝利的道理的人，一定也對於共產主義之可能轉變沒有信心，因之也不能在這種制度之內找到力量和方法來與之鬥爭。

至於共產主義國家，它們對「新階級」以及我的其他著作甚至小說，都故意忽視或加以禁止。但事實上呢，全東歐國家都有人把「新階級」偷偷地抄了，互相傳閱，在蘇聯則有人爲之而入獄。在這裏，我必須指出，共產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的官員們，今天都陷於一種進退兩難之境，他們既然無法說明我爲什麼「反叛」，便只好小心地避免提及我的見解，也避免談及他們怎樣的對付我。

有些共產主義的和非共產主義的蠢人們相信了那些對我的誹謗，以爲我之所以轉變另有污穢的動機，說我對共產主義肆意批評，對西方國家和它們的制度則緘口不言。我覺得我應該有所解釋，特別是因爲他們的指摘雖然是極可憎惡的謊言，却也有一點兒真理在內。我當年也和所有認真的教條主義者一樣，總以爲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了解世界上的任何社會，因之我也常常批評資本主義，也即是西方國家和西方制度。但不久之後，我就體會到我對它們的智識實在不夠，要批評這些國家，最好是由住在這些國家裏面的人來批評，並最後使這些國家轉變。這並不是說我對那些國家沒有意見，更不是說我以爲那些國家的社會型式可以用來作爲我的國家或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榜

樣。幾個世紀以來，巴爾幹國家都橫介於東西雙方之間，吸取雙方的影響，而形成其獨有的國格。我覺得這些國家應該和雙方一樣來往，不管其制度和意識形態如何。

我還必須提及這一點：有人以為我的思想和人格都有問題和前後不一致。當然，要了解一個共產主義的革命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史達林主義的實行者為什麼會先是反對史達林，繼則反對自己的制度，而現在則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反對，並不容易。而且，歷史上比我更偉大得多的叛變者和異端者以至所有的先驅者也都是前後不一致的。那麼，要了解我之所以前後矛盾，倒不如先了解一下我們這個時代的風暴以及我所處的環境。我不難於接受種植的責備，但我必須對我自己忠實。

今天，當我在寫這些東西時，我仍感到滿腔的不惜犧牲的熱情。我相信，爲了這本書，我多半會被誹謗和迫害。兩年以來，我本來是有機會可以相當舒適地和安靜地享受家庭的溫暖的。

自我表現，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夢想，這種要求是和生存下去的意志同其強烈的。……人的奮鬥和創造以及從事創造性的奮鬥，這種衝動是沒有盡頭的。

最後，我必須說一點關於我寫這本書的更深一層的動機。我想爲我的時代見證。

共產主義者相信他們已經把現實和未來世界裏的邪魔都清除了，但這些邪魔却又已經潛回來了，鑽入共產主義的靈魂裏，成爲共產主義的一部份。共產主義以科學爲招牌，以創造地上天堂爲號召，發動全世界勞苦的和被壓迫的人民，冒死來追求那種原始的夢想，但結果却在國內造成官僚，在國際上使一些國家爲威望，爲勢力，爲富源和市場而互爭雄長——它們所爭奪的東西，也正和其

他的政府和政客所互相爭奪的一樣。共產黨人爲了他們自己的觀念和社會上的實際情況，開始時是向敵人奪得了權力——一種最使人迷醉的東西——跟着使他們自己之間互爭。所有歷史上革命運動的結果總是如此。共產黨人因爲對權力如此的不知鑒足，他們所掌握着的權力便成爲絕對和極端的。在爭奪權力時，他們所表現的也如一般人一樣，一樣會犯錯誤，而不是像史達林所說的，是一種「特別的典型」。還有，共產主義者因爲是在各種各式的人民之上建立其政權，因之不得不放棄其國際的中心，也即是莫斯科和北平。由於各個共產主義國家各有其民族的特點，各有其所遵循的道路，共產主義已如駛入了未經探測的航路，事實上是走上了災難之路。共產主義本來是自以爲可以對世界問題作總解答，對人類作極權統治的，一到了各自以民族爲出發點，便到處出現了破裂與糾紛。共產主義的經濟，本來以爲是可以依照計劃，「廢除了爲市場而生產」，以達到「各依所需而消費」的——這樣的目的達到之後，有如列寧所說的，金子便可以拿來製成合金以爲洗滌器皿之用了——今天却不能不求救於自由市場和國際的黃金價格。共產黨人原以爲在他們勝利之後，戰爭是可以廢止的，但今天共產主義強國却在奴役共產主義弱國，而兩個共產主義集團——蘇聯與中共——之間，其衝突的可能性和危險性，正也不下於它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衝突。自以爲人類的「救主」者，今天却須自救。

共產主義的大災難對於人類並沒有損失。他們的災難主要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頑固地追求一種想像中的社會，滿以爲他們可以轉變人性，其結果是他們和他們的觀念都爲他們自己的暴力所摧毀。一如人類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在共產主義之下，也如在其他的情況之下一樣，人類是不能